

历史·文化

欧美学界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缘起、发展及特点

王林亚

摘要：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美国环境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环境史领域，关注的议题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东南亚生态环境变迁、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运动与保护政治等。经过20余年的发展，欧美学界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成绩取得了一些成绩。欧美环境史研究兴起于不同的历史和学术背景，欧洲环境史研究源于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界尤其是地理学家对东南亚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美国环境史研究则是建立在二战后美国为控制第三世界而对东南亚开展的经济、生态地理调查的基础之上。总的来说，欧美环境史研究具有较强的殖民色彩和跨学科特点，注重西方生态视角和东南亚本土环境知识的相互作用。随着研究范式和路径的变化，研究领域也逐渐从以生态、经济为中心扩展到包括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分析。欧美学界塑造了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欧美环境史学者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将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范围主要锁定在各自的殖民地，发展极不均衡。另一方面，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受到欧美环境史范式的影响，虽然关注环境运动、社会和文化分析视角、环境变迁等内容，但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欧美学界；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范式与路径；生态环境变迁

收稿时间：2021-01-20

作者简介：王林亚（1992-），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美国环境史、美国与东南亚外交。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态殖民主义视角下美国全球霸权追逐与东南亚环境变迁（1898—1975）”（项目编号：21CS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90年，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经济史学者马尔科姆·福尔库斯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史研究存在环境问题意识的缺失，经济史学家并非唯一忽视东南亚生态变化的学者，东南亚任何国家的环境史都不存在”^①。其言外之意是指东南亚环境史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从1992年开始，欧洲东南亚研究机

^① Malcolm Falkus, “Economic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14, issue.1 (July 1990), p. 65.

构组织的以东南亚环境为主题的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标志着东南亚环境史的诞生。欧美学者对东南亚环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视西方殖民主义与东南亚环境变迁主题。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环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东南亚环境史的研究有所忽视。^①本文拟对东南亚环境史在欧美学术界的缘起、发展及特点进行介绍，并指出东南亚本土环境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期丰富中国的区域环境史研究。

一、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在欧美学界的兴起

从历史和学术渊源来看，欧洲对东南亚自然环境的认识早于美国，起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15至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航海活动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17至18世纪，荷兰、英国、法国后来居上，一批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探险家通过地理勘察、植物探索观察、对比、记录热带东南亚的生态特征和物种分布，形成了最早的一批关于东南亚自然环境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欧洲对东南亚环境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一种是将其视为资源富庶的热带“伊甸园”^②，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历时8年在马来群岛进行考察和记录，不仅对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群分布进行考察和对比，还对亚洲和澳洲之间的动植物生态交流做出猜测和推断，提出“华莱士线”，创立“沙捞越定律”。^③约翰·霍勒斯、托马斯·诺克斯等人对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支那等地茂密的植被、人与自然的关系、繁多的动物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描述。^④另一种在欧洲流行的则是对东南亚环境成为“疾病温床”的描述。安东尼·贝托拉奇对锡兰岛这样评价，“康提岛上冒着‘不洁的空气’，地面满是腐烂的物体，

^① 国内关注东南亚环境史的学者不多，仅有少量文章和专著涉及这一主题。如：包茂红：《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述评》，《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4期；包茂红：《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吕桂霞：《牧场工行动：美国在越战中的落叶剂使用研究（1961-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热带”（tropical）是15至20世纪上半叶欧美对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南部生态自然的统一称谓，杂糅了地理学和生态学概念，与欧洲自身所处的“温带”（temperate zone）相对比，是西方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自然观。参见Beth F. Tobin, *Colonizing Nature: The Tropics in British Arts and Letters, 1760-182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p. 11-15; Paul S. Sutter, “The Tropics: A Brief History of an Environmental Imaginary,” in Andrew C. Isenber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8-198.

^③ Alfred Russel Wallace,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the Para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two volum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69, p. 47.

^④ John S. Horace,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ts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3, pp. 44-56; Thomas W. Knox, *Adventures of Two Youths in a Journey to Siam and Java with Descriptions of Cochin-China, Cambodia, Sumatr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880, pp. 78-86.

各种‘热病’流行，对白人来说尤为不利”^①。爪哇岛的森林也被视为“阴郁和不祥”，沼泽瘴气导致各种发烧疾病。^②

20世纪40至80年代，欧美地理科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依托早期博物学家、探险家等关于东南亚自然环境历史丰富的文字记录，对东南亚人与环境的关系开展研究。法国巴黎大学皮埃尔·古鲁考察了东南亚热带环境对人类定居和活动的影响，以及热带环境的局限。^③英国学者恩尼斯特·亨利·乔治·多比揭示了东南亚土地和社会的关系，从“东南亚自然景观、文化景观和社会地理学”展开论述，还对缅甸的农业地理、采矿活动进行了阐述。^④美国社会史学者查尔斯·费舍尔将东南亚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并试图通过对欧洲殖民时期的物理环境、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定义东南亚人的个性特征，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⑤英国赫尔大学社会政治系主任维克多·金在回忆学术生涯时谈道：“1968年，我接触东南亚人文地理得益于詹姆斯·杰克逊，他进行了该地区‘文化景观’的开拓性工作，通过各种比较研究证明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⑥1978年，英国气候学家彼得·斯托特对马来亚灌溉系统与环境、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物种特征进行了分析。^⑦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在东南亚的影响，自然科学界在研究中加强对东南亚复杂自然环境的理解。此外，欧洲还一直进行东南亚应用环境研究，以便在供水、污水治理和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开发及大型建筑项目中进行技术转让。

与欧洲不同，二战前美国对东南亚自然环境并未形成总体性的认识，仅开展了对菲律宾殖民地的森林、土地和疾病的管理，《菲律宾委员会报告》《菲律宾森林年鉴》及美国岛屿调查局记录了大量关于殖民地的自然生态、人文地理等情况。美国林学专家乔治·埃亨主管的林业局甚至将菲律宾视为实现“科学林业”的舞台，这也成为后来美国环境史学者热衷于研究美国对菲律宾森林管理的重要原因。^⑧

① Anthony Bertolacci, *A View of the Agricultural,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Interests of Ceylon*, London: Black, Parbury and Allen, 1817, pp. 4-5.

② James Johnson, *The Influence of Tropical Climates on European Constitutions*, New York: Wood, 1846, p. 88.

③ Pierre Gourou, *Les Pays Tropicaux: Principes d'une Géographie humaine et économ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8, pp. 1-6.

④ Ernest Henry George Dobby, *Southeast Asi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50, pp. 23-54.

⑤ Charles A. Fisher, *Southeast Asi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Methuen, 1964, p. 184.

⑥ Victor T. King, e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xvii-xviii.

⑦ Peter A. Stott, *Nature and Man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8, pp. 23-33.

⑧ Arthur Fischer,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Forest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898-1942)*,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Division of Insular Affairs, *Special Report of Captain George P. Ahern in Charge of Forestry Bureau, Philippine Island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1, p. 14.

战后，美国将东南亚视为重要战略之地，为了解东南亚及太平洋各方面的知识，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研究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以及殖民地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派遣大量调查员前往东南亚勘测土壤、气候，研究土地利用及矿物开采，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部主任卡尔·佩尔泽对欧洲在东南亚殖民地的旱地、湿地利用，灌溉、森林开发等进行研究，并评估了东南亚原始迁移农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①当东南亚逐渐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后，一些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也开始关注东南亚生态环境。

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文化人类学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领域丰富的资料，借鉴政治生态学理论框架对1616年至1942年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时期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土地面积的增长以及农业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高却造成了人口的持续贫困、生态退化和农业“内卷”化。^②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家简·彼德森则关注吕宋岛北部帕拉湾水域的觅食者，探究他们是如何利用周围自然条件并影响环境的。^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悉尼大学社会和经济史学家琼·哈迪审视了印度尼西亚自1960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概况，讨论该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包括土地资源管理、稻米生产生态、经济作物发展与环境、爪哇旱地利用及加里曼丹的渔业资源利用等，并分析自然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④

当环境史在美国和欧洲逐渐得到学术界认可后，欧美从事东南亚研究或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便直接利用前人的研究经验迅速进入东南亚环境史进行耕耘。20世纪90年代伊始，欧美学术组织和团体召开的以东南亚为主题的会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标志着欧美学界东南亚环境史的兴起。1992年，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批准了一项由经济和环境历史学者彼得·布姆加德主持的东南亚生态史项目，即EDEN（Ecology, Demography and Economy in Nusantara）计划。^⑤1994年，英国东南亚研究协会年会在皇家霍洛威学院举办，主题为“东南亚的环境”，同年荷兰莱顿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和亚洲国际研究所召开以“亚洲环境”为主题的会议。^⑥1995年6月，欧洲东南亚研究协会第一届会议在莱顿大学召开，探讨“东南亚历史上人与自然的互动”，尤其关注欧洲从重商主义到殖民扩张高潮再到跨国公司时期参与东南亚环境

^① Karl J. Pelzer, *Pioneer Settlement in the Asiatic Tropics: Studies in Land Uti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Colo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p. xiii.

^②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e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vi, 47.

^③ Jean T. Peterson, *The Ecology of Social Boundaries: Agta Foragers of the Philippin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78, pp.11-13.

^④ Joan Hardjono, *Indonesia: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

^⑤ Victor T. K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p.7.

^⑥ Michael J. Parnwell and Raymond L. Bryant, eds.,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eople, Poli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xiv.

变化的过程，吸引了100余名来自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①1995年12月，美国纽约社会科学理事会在夏威夷举办了题为“南亚和东南亚的环境话语与人类福祉”的会议，70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参加。^②1998年1月，由美国乐施会赞助的发展人类学研究所越南芹苴大学召开了一场题为“湄公河流域研究和能力建设倡议”的研讨会。^③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包罗万象，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欧美学界关于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主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环境史在欧美学术界得到极大发展，大量环境史论著在荷兰、挪威、美国和英国等国出版。经统计，纽约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全球环境变化”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东南亚环境主题的专著23本，涉及环境政治和资源管理、生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④1998年，挪威奥斯陆大学亚洲北欧环境发展研究所推出“亚洲人与自然”系列丛书，吸引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多学科专家参与。该系列包含多个研究主题：人们如何从自然中谋生，亚洲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感知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表现，土著资源管理系统及环境问题与环境运动等。该系列丛书最终出版专著4本，研究地域包括东南亚、南亚、日本和印度尼西亚。^⑤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自1851年成立后一直是东南亚研究的重镇，主攻东南亚经济和环境史的阿姆斯特丹大学著名学者彼得·布姆加德在2000年开始兼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后，相继在2001年组织以“东南亚水资源”为主题的研讨会，在2004年主办一场关于“东南亚岛屿渔业、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截至目前，荷兰皇家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社已经出版东南亚环境史专著32部，开展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圆桌讨论等60余次。^⑥

欧美东南亚学术团体组织的不同类型的环境主题，也反映出学术界考察东南亚环境史区域、内容和维度的变化。环境史概念内涵丰富，涉及内容庞杂，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曾谈到，“未来环境史主题更加广泛，将涉及到农业、资

^① Victor T. K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p. xvii.

^② Paul Greenough and Anna L. Tsing, eds., *Na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Environmental Projec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vii.

^③ Pamela McElwee and Michael M. Horowitz,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Lower Mekong Basin: A Landscaping Review*, New York: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1999, p.3.

^④ Michael J. G. Parnwell and Raymond L. Bryant,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eople, Poli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hilip Hirsch and Carol Warren,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Resources and Resist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9–20. <https://www.routledge.com/search?kw=environmental+history+in+southeast+asia>, 2020年3月17日。

^⑤ Victor T. King, e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p.v.

^⑥ *Highlights from Annual Report of KILIV, 2000-2019*, <https://www.kitlv.nl/wp-content/uploads/2020/04/Introduction-to-the-KITLV-Annual-Report-for-2019.pdf>, 2020年3月17日。

源、生物多样性、军事维度、土壤、采矿、移居、海洋等”。^①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欧美学界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区域性的东南亚生态环境变迁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地理情况复杂，拥有多种语言、种族、宗教、生态系统和政治制度，但东南亚在环境意象上经常被构想成一个由翠绿森林、原始海岸线和异国情调的河流景观组成的区域。随着区域发展步伐的加快，环境被牢牢地嵌入到整个区域各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中。^②因此以区域为单位，微观考察东南亚生态环境变迁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耶鲁大学任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和环境活动家理查德·格罗夫是最早试图描述东南亚区域环境变迁的学者。他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环境史学者维尼塔·达莫达兰等人共同勾勒了公元前1000年至1980年间南亚与东南亚的生态变迁史，通过考察分析印度尼西亚马古鲁群岛的人、动物与海洋环境，以及英国殖民缅甸时期的森林利用情况，旨在阐明东南亚环境变化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影响。^③荷兰莱顿大学的彼得·布姆加德以长时段的视角将东南亚置于四个全球化阶段，分析其卷入世界的过程，探究在此期间的生物入侵，人口增长、农业发展与环境，自然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比较殖民地时期和民族国家独立后生态恶化的速度，时间跨度从公元前5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④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地球科学院人文地理学教授菲利普·赫希则侧重于对东南亚环境史的专题研究方法，突出资源和环境问题中的机制、环境方面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介绍^⑤，这为当下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法。

湄公河地区的环境史是东南亚区域生态变迁的重要体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罗奇考察了1860年至1960年湄公河区域土地开发、环境变化与社会生活状态之间的关系。^⑥美国新泽西州大学人类生态学教授帕梅拉·麦克尔威和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专家迈克尔·霍洛维茨概述了湄公河下游盆地和三角洲的湖泊、土壤、洪水、牲

① J. 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② Philip Hirsch,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3.

③ Richard H. Grove, et al.,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828, 534.

④ Peter Boomgaard, *Southeast Asi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7, pp. xi, 3, 282. 这是ABC-CLIO出版集团组织的“人类与自然世界”系列丛书的组成部分，该丛书还包括四卷本的关于美国北部、西部、大平原和西部山区，以及太平洋海岸的环境史，其他十卷的区域范围包括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北欧、地中海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南亚、东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环境史。

⑤ Philip Hirsch,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15, 157, 313.

⑥ Pierre Brocheux, *The Mekong Delta: Ecology, Economy and Revolution, 1860-196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5, pp. xv-xix.

畜、大坝建设和作物种植造成的生态影响，突出湄公河地区环境问题的共性特征。^①与麦克尔威不同，分别来自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历史系学者玛特·斯图尔特和彼得·科克拉尼斯着重分析了湄公河三角洲环境变化背后的社会和经济机制，环境变化的后果和人们对此的反应。^②

（二）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

东南亚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历程，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一直是环境史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森林和海洋是东南亚资源过度开发的两大领域。第一，殖民视角下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荷兰历史地理学者格雷格·班克夫认为美国殖民菲律宾期间试图将吉福特·平肖倡导的“科学林业”运用于殖民地，然而，岛屿林业局很难在美国资本主义开发森林的最大利益和自然保护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这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性质的森林保护政策，1898年至1920年间是吕宋平原大面积森林砍伐的时期。^③内森·罗伯茨在殖民背景下探究菲律宾的林业观念及生产方式导致社会和环境变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揭示国家建设、帝国政府和国家政权之间在环境管理层面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④

第二，森林开发与国家资源管理机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专家南希·佩卢索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布在婆罗洲岛的森林进行了研究，认为伐木和公共道路修建标志着政府在扩展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却造成森林急剧减少，种植园也取代了多样化的原始森林，反而揭露出国家在资源管理机制上的漏洞。^⑤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迈克尔·罗斯展示了国际森林市场的波动及如何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制度，出口繁荣却带来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国家资源机构和森林政策质量的下降。^⑥

① Pamela McElwee and Michael M. Horowitz,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Lower Mekong Basin: A Landscaping Review, Volume I*, Mekong River Basin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1999, pp.18, 24, 99.

② Mart A. Stewart and Peter A. Coclanis, ed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in Mekong Delta*, New York: Springer, 2011, p.v.

③ Greg Bankoff, “Conservation, and Colonialism: Gifford Pinchot and the Birth of Tropical Forestry in the Philippines, in Alfred W. McCoy and Francisco A. Scarano, eds., *Colonial Crucible: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9, pp. 479, 485-486. 格罗夫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1946年前菲律宾森林遭受砍伐的程度，从90%减少到60%，参见Greg Bankoff, “One Island too Many: Reappraising the extent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rior to 1946,”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3, no.2, 2007, p. 314-315.

④ Nathan E. Roberts, *U. S. Forestry in the Philippines: Environment, Nationhood and Empire, 1900-1937*, A PhD Thesis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4, p.4.

⑤ Nancy Lee Peluso, *Borneo in Transition: People, Forest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6.

⑥ Michael L. Ross, *Timber Booms and Institutional Breakdown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 2.

第三，人与森林之间的关系。荷兰学者汉恩·克纳彭研究了婆罗洲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描述了民众如何利用森林环境开始农业、狩猎、畜牧业及森林产品搜集的过程，并充分讨论这些活动对森林的影响。^①澳洲国立大学亚洲学院东南亚经济史专家安东尼·瑞德对前殖民地时期东南亚人与森林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当地人对森林的依赖性较大，蔗糖、丁香、咖啡等森林商品的出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门答腊、爪哇、越南等地森林的减少。^②在东南亚开始现代性的生产方式之前，对森林的依赖性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当东南亚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后，人对自然森林的控制大大增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彼得·范德林特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希·佩鲁索探究了殖民和后殖民背景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生态与社会史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林业中的，殖民地的森林管理模式甚至成为非殖民化时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立世界森林管理机制的重要经验参考。^③

第四，渔业、水和海洋资源亦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澳大利亚默道克大学国际商业和亚洲研究所教授约翰·布彻生动地呈现了东南亚渔业是如何逐渐走向危机的，他认为从19世纪中叶政治和经济转型对渔业的刺激，到二战后至70年代捕鱼业迅速扩张背后的国内和国际背景，最终导致东南亚渔业在90年代面临崩溃。^④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专家彼得·布姆加德通过研究森林和渔业的发展情况，探究东南亚国家政府如何做到“可持续性经济开发”，即既能保证渔民利益和社会发展，又能维持和增强渔业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⑤2001年，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150周年庆典的会议主题即为“水”，水在东南亚历史上是一种“既能赋予生命却又致命”的力量，^⑥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型水坝和灌溉系统造成水资源的极度开发，与水有关的自然特征也在重塑东南亚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

① Han Knapen, *Forests or Fortune: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east Borneo, 1600-1880*, Leiden: KITLV Press, 2001, p.31.

② Anthony Reid, "Humans and Forests in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n Richard H. Grove, et al.,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106.

③ Peter Vandergeest and Nancy Peluso, "Empires of Forestry: Professional Forestry and Stat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Part On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2, No.1 (February 2006), pp.31-64; Peter Vandergeest and Nancy Peluso, "Empires of Forestry: Professional Forestry and Stat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Part Two,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2, No.4 (November 2006), pp.359-393.

④ John G. Butcher, *The Closing of the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Marine Fisheries of Southeast Asia, 1850-200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4, pp. 4-5.

⑤ Peter Boomgaard, et al., ed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Fisherie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Leiden: KITLV Press, 2005, pp.22, 23.

⑥ Peter Boomgaard, *A World of Water: Rain, Rivers and Sea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Leiden: KITLV Press, 2007, pp. vii, 19-20.

（三）农业发展与生态

东南亚历史上农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特征，殖民地时期以欧美国家建立的种植园模式为主，二战后美国又在这些地区推广绿色革命。关于东南亚农业发展与生态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种植园、绿色革命、土地这些层面展开。

第一，作为劳工、疾病和生态的种植园空间。种植园农业已经有400余年历史，17至18世纪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盛行成为一种经典的种植园模式，19世纪30年代后在欧洲操纵下逐渐复制到东南亚。1990年9月，美国东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经济研究所、荷兰皇家加勒比和东南亚研究所联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亚洲殖民地资本主义种植园”研讨会，从种植园概念、劳工招募和性质方面研究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锡兰岛和斐济岛等主要种植区的性质、种植园模式如何促进东南亚经济起步、种植园管理者为压缩成本造成契约劳工较高的患病率和死亡率。^①种植园被视为一种抽象的自然空间，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机械工具，除草、砍伐森林和种植等生产活动改造环境。^②传统殖民历史叙事中往往描绘的是白人在热带环境拓殖和开辟农业经济的形象，充斥着对欧美白人种植园开拓者的“敬意”。荷兰社会学家简·布雷曼指出，东南亚建立的种植园是一种农业综合型企业，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制度是对欧洲“文明教化”政策的违背，劳工不但忍受鞭笞之痛和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更要承受饥饿和环境灾难。^③

透过种植园研究东南亚环境变迁无疑是绝佳例证。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非洲种族史和社会环境史学者威廉·贝纳特、英国伯明翰大学全球环境史家科里·罗斯等史学家以马来亚殖民地的橡胶为个案，分析橡胶种植园造成的森林砍伐、土壤侵蚀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并得出结论：1900年至1930年间的橡胶热潮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生态和社会的重要分水岭，数百万公顷的龙脑香森林被整齐排列的橡胶树所取代。^④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大学全球环境史助理教授菊池道武·麻生甚至将越南橡胶种植园与社会、政治变迁结合起来，用生态视角解释橡胶如何重塑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探索东南亚种植园在科学、商业和管理方面的复杂关系。^⑤种植园鼓励欧美科学专家生产详细的生态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操控非人类的

^① Paul E. Baak, "The Conference on Capitalist Plantations in Colonial Asia," *South Asia Research*, vol.11, no.1 (May 1990), pp.89, 92.

^② James S. Duncan, "Embodying Colonialism?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ylonese Coffee Plantation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28, no.3 (July 2002), p.317.

^③ Jan Breman, *Taming the Coolie Beast: Plantation Socie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ix, 122.

^④ Corey Ross, *Ecolog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Empire: Europ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op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00; William Beinart and Lotte Hughes, ed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49-250.

^⑤ Michitake Aso, *Rubber and the Making of Vietnam: An Ecological History, 1897-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8, pp.3, 12.

“自然”，植物病理学家利用生态学控制植物生长，也促使专家通过将环境知识强加给民众而管理土地。^①马来西亚棕榈研究所对土壤侵蚀量进行了统计，认为在森林砍伐前土壤侵蚀量较小，砍伐后的土壤侵蚀量增加了5至7倍。^②

第二，并不绿色的“绿色革命”。环境史兴起后，国际学界开始对整个20世纪都至关重要的农业形式——绿色革命予以重新审视，绿色革命“伟大成功故事”的历史叙事被颠覆。借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史学家卡梅隆·缪尔的话来说，20世纪60至70年代风靡东南亚的绿色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业进步破碎的承诺”。^③1994年，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所评估了绿色革命对亚洲的环境影响，认为依赖灌溉和化肥的绿色革命已经导致大面积环境退化，问题包括病虫害增加、土壤营养元素流失、土壤毒性增加和涝渍等。^④以湄公河地区为例，大坝建设与各种政治力量纠葛在一起，水资源冲突的加剧、化肥的滥用和反而使得水稻产量下降，活跃于国际全球化论坛的印度环保活动家万达纳·希瓦称之为“绿色革命的暴力”。^⑤诚然，绿色革命让二战之后的东南亚国家很快提高农业生产并养活更多的人口，促使东南亚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腾飞，但这是以大量土地资源开发、土壤破坏等为代价的。

（四）环境政治、环境运动和保护

环境政治和环境运动本身就是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南亚环境史来说也不例外。环境变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国家精英、思想和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也涉及资本主义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穷人群体更多地遭受环境后果。^⑥

亚洲的土地投机已经演变成民众遭受环境非正义的例证，东南亚商业资本试图在“绿色沙漠”中建立高尔夫球场，这是一种由广泛使用的灌溉、肥料和杀虫剂等非本土草种组成的单一栽培景观，但平均每天需要3000立方米水以保持绿色，亚洲高尔夫球场平均每年消耗1500公斤化学物质，是农业所需数量的7至9倍，大量化学物质渗入土壤污染水源。美国史学家詹姆斯·费恩研究发现，当地民众的反对已经

^① Michitake Aso, “How Nature Works: Business, Ecology and Rubber Plantations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1919–1939,” in Frank Uekotter, ed., *Comparing Apples, Oranges and Cotton: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Global Plantatio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GmbH, 2014, p.198.

^② Alfred E. Hartemink,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Environmental Issues,” *Outlook on Agriculture*, vol.34, no.1 (March 2005), p.14.

^③ Cameron Muir, *The Broken Promise of Agricultural Progres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4, p.2.

^④ Prabhu L. Pingali,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Asia*,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94, pp.4–5.

^⑤ Vandana Shiva, *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Third World Agriculture, Ec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1993, pp.121–122.

^⑥ Victor T. K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p.2.

造成2名菲律宾人、3名爪哇人死亡，300多个家庭被迫迁移。^①詹姆斯·费恩认为政治是导致环境危机管理不善和腐败社会的根源，揭露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和对资源的滥用。他甚至认为泰国的环境民主运动充斥着意识形态色彩，可分为两大阵营，一类是草根活动家和农村发展组织，构成环保运动的主流，反对让民众远离森林，常被贴上“非政府组织”的标签；一类是自然资源保护者、生态学家和野生动植物专家，他们更倾向于自然科学，主要关心森林而非人类居民的福利。^②泰国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森林保护运动已经演变成一种民族运动，涉及森林居民角色和命运的深层次问题，“一种夹杂着种族紧张、隐藏的经济动机和不同阶层民众的森林观”的争夺宝贵资源的斗争，费恩谈道：“这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人属于森林还是应该脱离森林？每个人都有同等发展的权利，还是取决于住在哪里？”^③美国佛蒙特大学伊娃·沃伦伯格等人通过对印尼从独裁国家到地方政治秩序发展中林业部门作用的分析，得出结论：森林治理成为国家和社会关系调整中产生冲突的根源，森林权力下放和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关系，同土地使用权一样，森林管理权也应该由传统非正式的和法律正式的规则和机制共同管理。^④

环境正义活动不仅要处理确切的环境问题，还要关注环境正义、可持续经济、健康、生计、社会治理、种族和社会正义等内容。德国汉堡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所芭芭拉·舒勒重点关注东盟组织在区域环境政治和治理中的角色，东盟在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上的强硬态度表明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但各国政府的复杂利益也使得东盟在政策实施上进退两难。^⑤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文地理学专家菲利普·赫希以大坝建设、森林砍伐和种植、工业污染、采矿、旅游和其他有关发展的争议活动为切入点，试图阐明族群政治在争夺国家自然资源控制权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斗争的背后是对社会资源的控制问题，往往与地方的社会安全和集体认同密切相关。森林斗争则反映出国家和民众森林观念的冲突，缅甸森林特许权问题一方面反映后殖民政权的领土和财政收益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边缘少数族裔群体的主权和物质利益。^⑥而在菲律宾，环境社会运动则为菲律宾政治体系的议程和运作带

① James David Fahn, *A Land on Fi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Boo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3, pp.53, 54.

② Ibid., pp.6, 157.

③ Ibid., pp.147-148.

④ Eva Wollenberg, et al., ed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Forest Governanc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Fight for Control of Forests in Indonesian Borneo*,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2009, pp. xvii, xvii-xviii.

⑤ Barbara Schuler, ed.,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How are Local Cultures Coping*, Leiden: Brill, 2014, pp.156, 157.

⑥ Philip Hirsch and Carol Warren,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Resources and Resistance*, pp. 3-4, 330.

来重大转变。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泰国主要是生态恢复项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是以环境论坛为主，但老挝、越南和缅甸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活动却比较有限。由于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施加的压力，环保部门也在大多数国家的官僚机构内设立，如马来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都设立了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门、缅甸国家环境事务委员会、国家人口和环境管理部，然而赫希指出这些部门与官僚体制内部更大机构诸如投资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和能源部等存在着紧张关系。^①

东南亚水资源的生态、保护和管理是学界比较关注的内容。二战后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接受大量来自美国、德国、世界银行等国家和机构的贷款，走上西方现代化话语下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破坏。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人类学教授本·华莱士对卫理公会大学、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以及伐木公司签署的“林业研究与开发协议备忘录”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合作强调陆地生态系统能够恢复生产稳定的一项尝试，但这种保护模式并不适合农用林业的所有研究和开发项目，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森林破坏的后果。^②布姆加德等人尤其强调森林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问题”^③，“可持续”的实现需要技术、商业和人口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国家、社会和民众团体必须各自负有保护资源的责任，尤其是国家机制层面不能将保护流于“制度化掠夺”的一种虚假形式。^④环境史学者和管理规划者往往对东南亚国家和各级政府在渔业和森林发展中的作用给予批评，认为他们否认资源产权和基于社区的管理方式，自上而下的渔业政策和管理受制于经济激励，忽视其他科学界的建议。

尽管众多共同性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东南亚的安全，但东南亚在环境区域合作上依然步调不一。各国在跨境雾霾污染和湄公河资源管理问题上分歧众多，德国政治学家亨利埃特·丽塔披露了东南亚国家普遍不愿进行环境合作的事实，她认为这暴露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预算和环境治理上的制度脆弱性，东南亚生态系统将面临巨大风险。^⑤雾霾是东盟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帕蒂·纳格罗将东盟

^① Philip Hirsch and Carol Warren,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Resources and Resistance*, pp. 7, 8.

^② Ben J. Wallace, *The Changing Village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Applied Anthropology and Environment Reclamation in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ix, 14–15.

^③ 可持续性一词是指能够长期平均至少产生恒定水平的经济利益的资源使用系统，这一定义的灵感来源于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包括抽象的标准，例如保留“质量”和环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参见Douglas V. Smith and Kazi F. Jal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0, p.16.

^④ Peter Boomgaard, et al., ed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Fisherie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Leiden: KITLV Press, 2005, pp.5, 10.

^⑤ Henriette Litta, *Regimes in South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Wiesbaden: VS Verla, 2012, pp.12, 14.

雾霾治理作为区域环境制度在多层次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独特案例，并整合到国际关系、政治学中寻求解决方案。^①

面对东南亚环境保护和发展面临的困境，美国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史丹佛和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家铂西·萨吉斯先是在1993年至1997年发起“亚洲维护：环境维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政策联系”的讨论，后又在1996年至2004年资助研究项目“亚洲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制度背景：跨国、跨部门和跨学科方法”，他们从东西方环境概念出发重新思考“保护”尤其是“自然”和“文化”基本概念在东南亚的适用性，并超越国家和机构的保护话语去研究民间、社区和本土的保护话语，为东南亚环境保护提出可借鉴性意见。^②

三、欧美学界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总体上看，欧美学界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特点，透过环境史这一视角展现东南亚发展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学术领域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拓展了欧美学界对于东南亚史研究的视野，而且为研究欧洲、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外交史学者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殖民扩张、生态与帝国研究特色突出。东南亚历史上长期受到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不少欧美学者在东南亚环境史研究中热衷于研究帝国扩张的“生态殖民叙事”。英国牛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姆·贝纳特等人将欧洲帝国主义与全球环境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探究在帝国主义力量的推动下，英国消费者和制造商如何在大量的采掘和农业系统中引起当地社会和环境的改变。他们详细回溯了橡胶种植园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过程，并评价道：“这种创新与工业化、生态和经济的结合，超过蔗糖行业支撑了当时英国帝国发展最快的种植园复合体，造成森林砍伐、土壤侵蚀等恶果。”^③

除殖民主义造成的生态变化外，一些研究者还侧重于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互动。理查德·格罗夫最早涉猎这一领域，认为“西方的环保思想来源于欧洲热带殖民地一些森林管理者、地理学家和热带医学人员推行的‘环保主义’，这些人却并非是在20世纪初推动东南亚自然保护的人”^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特蕾莎·玛丽·文图拉考察了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如何利用构建的关于热带自然的意识形

^① Paruedee Nguitraooo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SEAN'S Regime for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p.1.

^② Michael R. Dove, et al., eds., *Beyond the Scared Forest: Complicating Conservation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xi, xi-xii.

^③ William Beinart and Lotte Hughes, ed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39-240.

^④ Richard H.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i.

态在菲律宾引入“现代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其融入世界贸易的过程。^①她想要表达的是科学改革如何促进帝国控制和民族主义政治，以及美国帝国的实践如何在当地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演变的。用约瑟夫·墨菲的话说，“殖民主义依然重要”^②，它是认识世界环境变迁的重要参照物。科学林业于19世纪末发端于美国，后来在英国帝国森林史中被众多学者所关注。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历史地理学者格雷格·班克夫另辟蹊径，他研究美国林务员吉福特·平肖的科学林业思想在菲律宾殖民地的跨国实践，探究美国一代环境管理者在资源保护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③

二是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欧美地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界本身就是东南亚生态史的丰富土壤，历史学家进行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大多都借鉴了自然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但凡东南亚环境史相关主题的会议召开，都会吸引来自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不同学科学者参加，例如在2001年荷兰皇家加勒比和东南亚研究所150周年庆典会议上，彼得·布姆加德甚至谈到，“东南亚环境史特定的一些主题有必要由文化人类学和医学等学科完成”^④。此外，东亚环境史学会在2009年建立，但遗憾的是，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尚未建立专门的环境史学会和刊物，有关环境史的成果也只能发表在有关东南亚政治史、外交史和欧美环境史刊物上。

三是诞生之时就与社会文化史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环境史研究范式出现了“文化转向”，从注重物质层面分析到重视社会层面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到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经历和感受，重视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社会和文化分析工具。^⑤东南亚环境史是伴随着欧美环境史的“文化转向”而诞生的，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特色。安东尼·瑞德考察15世纪前东南亚土著对热带森林的依赖，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处于蒙昧状态。^⑥东南亚人的环境认知，以及环境和语言与在对自然世界的分类、象征、命名和描述之间的关系，通过关注土著民众对森林和自然的看法，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根植于东南亚传统环

① Theresa Marie Ventura, *American Empire, Agrarian Reform and the Problem of Tropical Natur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16*,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umbia, 2009, pp.37-82.

② Joseph Murphy, *Environment and Imperialism: Why Colonialism Still Matters*, SRI Papers, 2009, p.22.

③ Greg Bankoff, “Deep Forestry: Shapers of the Philippine Forest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8, No.3 (July, 2013), p.5.

④ Peter Boomgaard, ed., *A World of Water: Rain, Rivers and Sea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Leiden: KITLV Press, 2007, p. vii.

⑤ Richard White, “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 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Historian*, vol. 66, no. 3 (September 2004), pp.557-564.

⑥ Anthony Reid, “Humans and Forests in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 no. 1 (February 1995), p.107.

境价值观的保护哲学。^①丹麦罗斯基勒大学社会与全球化研究所专家奥莱·布鲁恩等人对亚洲人的自然观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对东南亚环境运动的研究中重视诸如泰国佛教徒的生态观，将宗教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甚至将民众反对官方的环保主义与佛教的和谐、正义、和平等概念相联系，则显得顺理成章。^②美国华盛顿特区政策研究所所长约翰·卡瓦纳和华盛顿大学国际环境事务研究院专家罗宾·布罗德指出，菲律宾的许多贫困渔民、农民，甚至整个贫穷的亚洲人不赞成或不理解无害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尽管市场和政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关键的推动者仍然是公民组织。^③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皇家研究院国际亚洲研究所于2000年在莱顿举办了题为“婆罗洲殖民历史的环境变化：过去的教训与未来展望”的会议，从不同学科角度考察婆罗洲这一岛屿的环境历史。美国密苏里大学瑞德·沃德利不仅探讨了英国殖民主义背景下婆罗洲相互交织的生态和贸易的历史，而且关注了前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对婆罗洲森林的管理和商品化，荷兰和后来的继任者都利用生态资源控制广阔的环境地域，认为目前婆罗洲的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政治和经济竞争的领域。^④瑞德的叙事模式较为有趣，他还令人信服地指出欧洲人对婆罗洲的生态认知在构建自然和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殖民者改变了社区生活、宗教和生产模式，以使他们适应自然。

四是南北环境冲突提供思考。包括东南亚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都遭受欧美的殖民侵略，自然资源也未能幸免。战后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又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话语和发展模式，然而，资源开发和为世界工业市场提供原料的角色并未改变，东南亚在战后生态恶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前期。东南亚环境史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成为南北双方在全球环境问题上面临冲突的证据。扎瓦维·易卜拉辛发现，“尽管南方领导人普遍反对北方的环境霸权，但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与北方相同的面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并未从根本上偏离现有的发展范式”^⑤。

五是西方生态视角和地方本土环境知识的相互作用。美国统治菲律宾期间，林业局发起了研究本土迁移农业的生态知识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布伦丹·路易

① Peter. A. Stott, ed., *Nature and Man in Southeast Asia*, pp.1-3.

② Ole Bruun and Arne Kalland, eds., *Asian Perspectives of Nature: A Critical Approach*,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ordic Proceedings in Asian Studies, no.3, 1992, p.1.

③ Robin Broad, John Cavanagh, *Plundering Paradise: The Struggle for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16.

④ Reed L. Wadley, *Histories of the Borneo Environme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Leiden: KITLV, 2005, pp.8, 27, 213.

⑤ Zawawi Ibrahim, "Epilogue: A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 in Victor T. K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pp.342-343.

通过研究阐明，林业局的知识项目是要总结菲律宾本土迁移农业中合理的生态观念因素，进而完善和推行吉福特·平肖推崇的资源保护主义而非自然保护主义式的环境观。^①帝国史研究不但注重本土生态知识的搜集和利用，也会在无形中将本国的环境观念贯彻到殖民地实践中。荷兰环境史家弗里克·科隆比金详细考察了荷兰殖民地农业专家是如何将荷兰式的农业和景观模式，运用到西苏门答腊土地开发中，爪哇的集约型、灌溉和水稻农业模型能追溯到荷兰圩田概念——一个依赖于水资源的集约和高产的人工农业系统。^②西方生态知识在当地的实践过程并不顺利，同一片土地上欧洲蔗糖种植者与爪哇水稻种植一起轮作，但后者投诉前者的化肥使用导致水稻产量的下降，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聚焦全球南方（现代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农业与制造业技术史领域的苏珊娜·沐恩通过对英国皇家植物园植物学家和化学家，以及荷兰土壤学家之间关于这一问题争论过程的考察^③，揭示了西方生态视角和本土环境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六是既关注东南亚区域性的环境变迁，也聚焦国别环境史研究。彼得·布姆加德等人不但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环境史的地理、历史和人类学元素，还论及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灾害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尤其注重从长时段的视角研究，试图为当下印度尼西亚环境退化问题找出症结所在。^④布姆加德著述颇丰，他撰写的《恐惧的前沿：马来世界的老虎和人民》^⑤记录了该地区 350 年来老虎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再现了一个人们害怕老虎但经常接触老虎的世界，展示了人与老虎如何彼此适应的行为，并解释了欧洲人的文化偏见和土著居民之间的阶级差异如何影响对老虎的态度。这本书将马来国王、殖民统治者、耍虎者和赏金猎人的故事与关于老虎及其生活方式的事实交织在一起，是环境和微观历史的引人入胜的结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菲利普·赫希专攻泰国环境史，通过呈现泰国东北部激进的僧侣与国家竞争环境话语的现象，触及“环境与地方政治”这一话题，内容包括泰国地方委员会和社区森林管理，城市发展、工业和环境等。^⑥东南亚本土学者撰写的环境

① Bredan Luyt, "Narratives, Shifting Cultivation and Knowledge Projects in the Philippines, 1901–1941," *Library Information Library*, vol. 33, no. 1 (November 2017), pp.1, 50.

② Freek Colombijn, "A Dutch Polder in the Sumatran Mountains: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Ideals of the West Sumatran Peasant and Landscape," in Victor T. King, e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outheast Asia*, pp.53–54.

③ Suzanne Moon, "Empirical Knowledge, Scientific Authority and Native Development: The Controversy over Sugar/Rice in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1905–1914,"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0, no. 1 (February 2004), pp. 59–60.

④ Peter Boomgaard, Freek Colombijn, eds., *Paper Landscapes: Explorat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ndonesia*, Leiden: KITLV Press, 1997, pp.3–19.

⑤ Peter Boomgaard, *Frontiers of Fear: Tigers and People in the Malay World, 16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8.

⑥ Philip Hirsch, ed., *Seeing Forests for Trees: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ism in Thailand*,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7, pp.156–160.

史著作也开始崭露头角，蒂莫西·巴纳德在两本著作专著中论述了自19世纪以来，新加坡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特征影响了该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历史。^①他不但关注外来动物贸易、城市绿化等主题，还试图探讨人类如何与自然互动、环境如何影响人类。巴纳德尝试追溯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这一形象的前因，开启了一种对过去的新叙述，将新加坡的故事建立在对其环境的理解之上，而不仅仅是关于贸易、移民和国家建设的故事。

四、结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欧美学界不但引领了东南亚环境史的研究，而且欧美环境史研究范式对整个东南亚环境史学研究的影响极大。换句话说，欧美学界塑造了东南亚环境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欧美环境史学者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将东南亚环境史研究的范围主要锁定在各自的殖民地，发展极不均衡。另一方面，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受到欧美环境史范式的影响，虽然关注环境运动、社会和文化分析视角、环境变迁等内容，但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与欧美学界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东南亚本土的学者面临挑战，他们似乎缺席了东南亚环境史的相关研究。未来，东南亚本土学者应当更加重视环境运动研究，努力突破社会史、生态史和科学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与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强劲势头相呼应，书写独具自身特色的东南亚环境史新篇章。

[责任编辑：郑佳]

^① Timothy P. Barnard, *Nature Containe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4; Timothy P. Barnard, *Nature's Colony: Empire, Nation and Environment in the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Singapore: NUR Press, 2016, pp.65-89.